

通渭书画热的因由初探

景 晖 姚顺元

通渭的书画热，较之其他“热”现象，显得更持久，更厚实，并且不时升温。1992年12月，“通渭农民书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把这个温度再次升高。一个黄土高原的穷县出现这件事，已不是一种表面的简单的现象，其内在的因果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它每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很少寻根探源。这里我们试作几点初步考证。

一、历史、地理因素的长期滋养。

首先，就地域来说，通渭县境位于黄河中上游的渭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一部分。从古至今，通渭一带属于连接我国中、西部的结合地区，又属于“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东西通道的中路轴心地带。虽然山穷水枯，物产不丰，经济一直很落后，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必然会对这里产生直接影响，因而促使文化先于其他发展，则不是什么“怪”现象。

其次，从历史沿革来看，通渭境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古迹表明，至迟约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大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劳动，繁衍生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发展着精神文明。属于古老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以及后来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类型的遗址文物，至今大量遍布。横跨县境125公里地段上的战国秦长城遗迹又表明，早在公元前270年以前，当时的秦国就对今通渭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管辖。

又至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元鼎初年，就在这里建立了平襄县，并定为天水郡的治所。后在公元1106年以来的880多年间，一直在这里设置着通渭县。自然成为当时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历史上，这一带又曾是留军屯田或移民开发地区，这就更加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大融合，逐步形成了兼容并蓄、雅俗纷呈、光彩斑斓的地域文化氛围。

其三，通渭地域文化的发展，还与当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开通”或“闭塞”，“发展”或“冷落”时期形成的双重性有关。一方面，“开通”时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甚至世界优秀文化得以引进、吸收、融汇和继承；另一方面，又随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显得“闭塞”时，又恰恰使书画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也与其他某些糟粕一起得到保守、保留和稳定。

其四，历代文人、学士的影响、倡导和传播促进了通渭书画文风的发展。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东汉夫妻诗人秦嘉和徐淑，明代工部尚书赵荣、开封知府王瓚、清代四川按察使牛树梅、四川威远知县李南晖等，都是当时俊秀，对家乡文风的影响之深自不必说。从明万历到清末360年间，通渭共出进士8人，举人102人，贡生338人，文童秀才数以万计。这些人大都能诗文，善书画，对当地文化包括书画艺术的传播促进不言而喻，以书画见长而影响全县者也层出不穷。某些外籍人物也在促进通渭书画发展中功绩不小。从古代到近代，外地人来此地执政、从教者很多，其中不少人兼擅书画，有的墨迹至今珍藏于民间。清乾隆时任过通渭知事的山东人冷文炜，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着“家有冷字不算穷”的俗语，可见其影响

之深。

二、通渭人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的生动反映。

历史上，通渭人民世代保持着“崇仁尚义”、“仕勤读书”以及勤劳艰朴、淳厚温雅、达观进取、坚毅沉着等良好的民族心理和崇高的价值观念。人们无论写字作画还是求书索画，不单是只图浮浅的表面化享受，而是寄寓着崇尚传统文明，讲究伦理道德，尊重学者文人，珍惜友谊，优化社会环境，追求真、善、美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这里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人敢于涉足且勇于深入书画艺术这种高层次的文化艺术殿堂，也正是当地人民群众的优秀品质及顽强性格的生动反映。他们对待书画这种精神财富，也和对待深藏黄土、岩石之中的物质财富一样，以强似“掘矿”、“淘金”的精神和劲头，不畏艰辛地去执着追求和开发。所以说，通渭人的性格品质，也和黄土地上默默勤耕的黄牛、黄土地下深深埋藏的宝石以及浩瀚艺海中莹莹寓光的书法一样，显得特别坚定强韧，深沉质朴。人们的这种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也就为书画这一古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在本地发展繁荣，打下了最为雄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三、直接的现实原因。

一是改革开放政策给通渭书画艺苑带来了新的春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其新的文艺政策指引下和全国书法热的推动下，素来酷爱书画艺术的通渭人，如鱼得水，象鸟飞天，乘着时代潮流，很快掀起了一个老中青少展帖练字，城乡群众求书挂画，装裱工艺蓬勃兴旺的生动局面。

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振兴书画艺术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和现实可能。随着新时期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实行，全县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丰富精神生活既成了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而且更有了实现的可能，为从事书画艺术创作也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正如有的群众说：“有吃有穿，清吉平安，字画满堂，生活自然”。

三是各级领导的重视倡导和有识之士的热情扶持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1982年以来，县委、县政府都把群众书画活动当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振兴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不懈地加以倡导，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对全县书画事业作出了很大努力。而且有的还直接担任了县书画协会会长或名誉会长、理事，有的带头钻研书画艺术，身体力行，为通渭书画艺苑增添了光彩。还有定西地区、甘肃省和中央有关领导机关以及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等书画艺术团体、省内外书画名人，也都适时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这种空前难遇的良好大气候，无疑对通渭书画艺术的发展繁荣增加了强大的推动力。

完稿时间：一九九三年三月

作者单位：通渭县委统战部

对榜罗党家庙堡子和平解放的回忆

李子安

1949年7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固关峡战，将国民党西北军的长官马步芳王牌军全面击溃后，乘胜追击，天水、甘谷、礼辛等地相继解放。通渭的反动派及伪县长李志漠深知末日来临，仓惶西逃榜罗，继由县城和榜罗的自卫队保驾，由今马陇公路一带而去。不几日，通渭解放。

由于反动武装的骚扰，群众已在恐惶之中，加之群众对当时的形势和解放军都不完全理解，听到战事十分紧张后，都躲在堡内，并紧闭堡门，不敢出入。榜罗的反动武装觉察到解放大军快到，于四九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当年闰七月）下午夜幕降临之际，将武器丢于堡楼底下，越堡而逃。堡内只有群众。天黑时分，黑云密布，一阵小雨，堡内群众乱作一团，有的也想离开堡子，但堡门紧关，一时难走。

不一会，响起枪声。十点左右，枪弹直接射向堡内，十分密集。群众已有伤亡，个别健壮男人越墙逃身，留在家里的女人恐惶投井；而堡内临时推选的头人仓惶逃走，群众慌乱成一片。原来这是解放陇南的解放军先遣部队于九时左右到达榜罗后，见堡墙上灯火时隐时现，误认为堡内有国民党残余，欲借堡负隅顽抗而进行的火力侦察。但堡内始终未见还击迹象。解放军一时虚实不清，火力愈加密集。就在这刻不容缓之际，我同朱书琴（河南照相师）商议：解放军一定是对堡内情况不明，

百姓才遭此无故伤亡。现在咱们必须摆脱堡内领导，代表全堡人民向解放军求救，开门迎接，才能解除误会，解救群众。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商量既定，我俩便冒着危险，登上堡墙，向解放军大声喊话：“解放军同志，不要打了，堡内没有一个反动武装，全部是老百姓，现在百姓已有伤亡，恳求停火，我们大开城门，欢迎解放军。”解放军听到我们的喊话，随即也向我们喊道：“可以停火，但堡内必须派出代表来交谈。”话音未落，朱书琴抢先说：“我下去文谈。”这时紧张气氛逐渐缓和。朱书琴便腰系麻绳从堡墙上溜下，到解放军临时住处详谈了堡内情况，并订立了几条协议：一、保证堡内绝无反动武装；二、翌日天明开堡门欢迎解放军进堡驻扎，并接管一切；三、群众保证安静并听从解放军指挥；四、事前因惊惶而远避的群众必须速回家园安心生产。当朱书琴带着“和谈”喜讯原由吊绳上返回堡子时，群情激奋，问这问那，群众都为免于战火之苦而高兴。我和朱书琴马上写了几十条标语，准备在欢迎解放军进堡时张贴。

第二天，即农历七月十七日，天还未亮，堡内群众又骚乱起来，说解放军不相信条约，再度打起来。故督促我们尽早准备，天亮后迎接解放军。天将黎明，我便手捧标语，朱书琴也带着罗发荣、尹俊等几个老人开门迎接。解放军早等在堡门外，堡门一开，便立刻涌进堡子，接收了榜罗党家庙堡子。榜罗镇人民由黑暗走向光明，全镇解放的难忘时刻。

榜罗休整了两天后，继续西进，不久通渭县城

解放，并建立人民政权。榜罗区也相继建立，区委书记为刘汉亮，区长为白明德。从此民心安定，生产不懈，并做了大量支前工作。

多植树 少造林

适 之

阳春三月，人们又关心植树造林的事了。一天，听一村干部说：“现在是植树不多，造林多。”颇觉新奇又颇为不解，细听之方解其意。

原来他说的是近些年，农村植树一年比一年少，但统计数字却一年比一年多，其实都是村干部们不得已坐在茶炉子背后‘造’出来的。他还诙谐地说：“我们这些年‘造’的林，连起来，恐怕只少也‘造’到北京了”。

听完此话，我产生诸多想法。

其一，我真佩服老百姓对中国汉字的精通和对汉语修辞的绝妙运用。一个“造”字，一语双关，表面看，“造”者广植也，实则编造之造，双关中还楔入“精警”——看似矛盾，其实非常严密而富有哲理。因而，既是对编造行为的入木三分的讽刺，又对编造者们给予诚恳警示：树只有植于泥土才会长成参天之大材，结下丰硕之果；若造在表册里则是“造数”而并非“造树”，其结果小而言之，必是荒了山荒了坡，大而言之则荒了国土，谎了人民，谎了子孙，也谎了自己。

其二，由此我还想到，树是一棵一棵植的，植的多了便成了林。这里需要的是实干精神，要诚诚实实，老老实实，扎扎实实，植一棵算一棵，植百棵算百棵，今年植一些，明年植一些，每年如此，何愁树不成林？又何愁国土不美，人民不富！倘若我们不是这样一棵一棵，坚持不懈地植下去，而是坐在茶

炉子背后，大片大片地“造”下去，那便是极大的造孽。古人云“天造孽犹可追，人造孽无可逃”。今人应该比古人更明智，更聪明，何必将自己置于无逃之地呢？

其三，我还真佩服农民同志们的直言不讳，与对问题一针见血的态度，这同官场上某些人的唯唯诺诺，含糊其词，甚至编虚说谎，弄虚作假相比较，该是多么的实事求是，又是多么的具有负责精神？也真钦佩村干部们的坦诚直率，虽然也参与了编造，但毫不掩饰自己的错误，这又叫那些文过饰非，言过饰非者相形见绌。这里还应当指出，村干部们编造是有他们的苦衷的，世上的事原本就有可为而不得为，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两种，我们何以要责怪他们呢？

其四，这话还带有普遍意义。“大跃进”年代，通渭百姓吃够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苦头，说起浮夸大有谈虎色变之惧，因而无不深恶痛绝。然而，近些年，浮夸之风时有抬头，大至国民经济总产值，小至一村一社的植树造林之面积，总有水分渗在其中，个别人为讨好上级，以达到领功授奖、飞黄腾达之目的，欺上瞒下，苦心经营，不惜大造特造各种生产指标，上级也不考虑其可能性，常叫这些人非载誉而归即得利而还。于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演出比“大跃进”年代的浮夸更浮夸的闹剧来。这种好大喜功、弄虚作假，而在具体工作中毫无建树的假大空作风，也是只“造林”不植树的表现。想必人人都知道“树是一棵一棵植的，植的多了便成了林”的道理，但如何编有如此悖谬呢？

眼下，正值植树季节，殷切希望大家多植树，少“造林”，树植的多了，自然会成林的。

闲话牡丹

曹志仁

据资料记载，牡丹原产我国西部秦岭、大巴山区。直至现在仍发现有单瓣野生种。在一千多年前，牡丹野生种被引种下山，后经人们长期栽培选育，才逐渐变得雍容华贵，被誉为“花王”。现在，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栽培的牡丹品种多为中国引进。百花丛中，牡丹花居群芳之首。唐诗中有“国色朝酣酒，天光夜袭衣”之句，故以后“国色天香”便成了牡丹花的誉名。牡丹有重瓣、单瓣之分。从花形、花色等又可分辨出多个品种来。牡丹以它的花朵大、花形美、花色艳丽、香味袭人而著称，故在我国花卉中占有独特地位。关于牡丹的传说很多，一说为武则天称帝时，于隆冬下诏，命后花园的百花开放，为她庆贺升平，但“时至众花多开，唯牡丹不从”。则天一怒之下，把牡丹贬至洛阳。后来，洛阳牡丹最盛，因而，被人们称之“洛阳花”。至此，人们不但赞扬牡丹花芳姿艳质，压倒群葩，更赞扬它刚正不阿的崇尚气节。怪不得至今牡丹花还在和倔强、坚韧、百折不挠，象征中华民族性格的梅花“竞选”中国的“国花”哩。

牡丹，不仅是名贵的花卉，而且是名贵的中药材。牡丹根经加工、焙制的丹皮，具有清热、凉血、和血和散瘀等功能。牡丹花还可用来酿酒和泡酒。年事高者，若每天适量饮用牡丹花酒，对健身乃至延年益寿大有效果。

牡丹的叶与另一种人们称作花相——芍药的叶极相似，同属毛茛科芍药属。只不过牡丹为木本，芍药为草本，故牡丹又有“木芍药”之称。牡丹耐寒畏热，喜燥恶湿，喜深厚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肉质根系极怕水涝。牡丹在年平均气温 10 ~ 20℃ 最为适易，最低不下于零下 22℃，最高不高于 40℃。

多年来，洛阳、菏泽的牡丹久负盛名。现今，品种已逾四五百种，且年有新出。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每逢花期，不夸张地说，随处都是牡丹花海。此时，来自国内外的旅游者和艺术工作者前往观光、品评、绘画、摄影，呈现出一派车水马龙，万街空巷的景象。就通渭而言，据史籍载，牡丹的栽培历史少说也有四五百年。通渭的气候、土壤条件等对牡丹的生长极为有利。加之通渭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栽花种草的传统习惯，故百年来，牡丹花在通渭一直在默默无声中不断的生息和繁衍着。“立夏”至“芒种”之际，在通渭境内，是牡丹花自东南部川壩向西北部高山区次第盛开的季节。在此时，若去观赏大片或较大的牡丹园(场)地时，在那争奇斗妍，闹烘烘的红牡丹、粉牡丹、白牡丹、黄牡丹、紫牡丹各花色交相辉映，五彩缤纷的气氛中，往往使人产生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感觉。由于至今通渭牡丹的“知名度”不大，故就品种而言，与洛阳、菏泽等地我国牡丹栽培中心相比，自然大有逊色，不过，还得提如下事实：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通渭牡丹种子多次销往山东、河南等地，经当地花农育成花苗后又返销甘肃各地。故通渭人戏言：“咱县的牡丹又回娘家了！”

通渭牡丹的重瓣品种有 20 多种，单瓣品种约 60 余种。就其

对牡丹花的命名来说，就有“大红绣球”、“白绣球”、“朱砂”、“玫瑰红”、“美人容”等名称。其实，现通渭的牡丹品种，按其全国的通称命名来说，白色的就有“昆山夜光”、“白楼”、“白玉”；粉色的有“赵粉”；红色的有“状元红”、“老君炉”（又名“火炼金丹”）；紫色的有“乌龙捧盛”、“泼墨紫”，更有黄、绿色的“桃黄”和“豆绿”等。长期以来，通渭城乡，不论机关、学校还是民户等，一直有栽花种草的传统习惯，尤以牡丹、芍药等花为重。在旧社会，一般富户多有花园，在移花接木时，总以牡丹为上品，并遵循“红为上，白为下”的习俗，在花园或庭院按既定“位置”定植，多则数十株，小则六七株；贫者，自然谈不上有花园，爱好者择地而植，多则三五株，小则一两株，另外，县境内各庙宇（山场）、机关、学校及宗教场所对牡丹花等，均有栽植。解放初和七八十年代以来日盛。五十年代初，县城隍庙院内的一株白牡丹有四十多年的树龄，主干径粗约4寸，高两米许（长势斜）；“县城仁和街张家的10多株牡丹（七个品种），有50多年栽培史，其主干最粗为4寸许，最高为7尺余；县城东北五公里处邓家坪曹家的20余株牡丹（十余种），已有30多年的栽培史，最高者达8尺许；县郊南山杨家种植的大小牡丹140多株（丛），约七八个品种；第三铺乡城墙湾杨家种植牡丹虽然时间短、品种少，若有机遇，百余株牡丹只经济价值而言，仅丹皮就可收入近万元；在五六十年代，县人委会、武装部和部分县直单位多植牡丹；七十年代，县种羊繁殖场在海拔2400多米的上大山场部内栽培的几十株（丛）牡丹至今长势良好。需特别一提的是，七十

年代后期，在省、地委路线教育工作组的倡导下，今陇阳乡陆义行政村在李家寺北坡梯田开辟了60多亩的经济林园（时为生产大队林场）。当时，主要引进种植了核桃、花椒、牡丹（约千余丛）三种经济作物。后经该村领导的重视、管理人员的精心培育和繁殖，至1993年时有大小牡丹两千余株（丛），且长势好，品种较多（约十余个品种），并有不同于通渭原有品种的新种。自1992年以来，先后向定西等地出售了部分牡丹苗木，仅此一项，经济效益实为可观。不过，近年来由于管理不善等原因，有所荒芜。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通渭而言，城乡种花者日多。鉴于时代、环境、条件诸多因素，就养花爱好者来说，总视牡丹为珍品，若有条件，必植之。现全县23个乡镇牡丹的种植相当普遍。

在八十年代后期，虽然兰州市在榆中县定远开辟了甘肃省最大的牡丹种植、栽培实验基地，现已成为当前陇上规模最大的“牡丹公园”，但就牡丹的栽培历史之久、种植之广、数量之多、品种之佳而言，陇上的“牡丹之乡”当之无愧通渭！

祝愿“知名度”不大的通渭牡丹，早日走出困境，造福于通渭民众。